

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杨明全 赵 瑶

摘要：基础教育学被列为教育学二级学科，为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政策导向、理论自觉与实践诉求三重驱动逻辑的推动下，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遵循守正创新、知行合一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既要实现培根铸魂与推陈出新的辩证统一，又要坚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同时在国际对话中平衡自主性与开放性。“三大体系”建设为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行动指南，要通过强化学科体系根基、深化学术体系创新和建构话语体系矩阵，系统推进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科建设；“三大体系”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5)04-0014-10

2024年1月，基础教育学正式进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基础教育学获得了独立的学术身份，更意味着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体系化建构的新纪元。基础教育在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不同于学前教育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方式，也区别于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培养国民基本素养、奠定终身学习基础等独特价值，因此有必要建构专门的基础教育学知识体系。

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中国教育学引进和吸收西方教育学知识，在合理借鉴与教育学相关的其他学科成果基础上，通过传承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从知识层面概括和提炼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教育领域观念、概念、命题等进行诠释和解答而生成的，能够被与教育相关的人所理解和掌握的具有结构化、层次化的知识系统。^①作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有利于基础教育学学科建设，又能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对构建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驱动逻辑和基本遵循进行分析，进而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角度提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2年度“十四五”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经验的国际传播研究”（22JJD880007）。

作者简介：杨明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赵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① 侯怀银，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J]，教育研究，2024（4）：58。

一、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驱动逻辑

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学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基础教育实践挑战的必然选择。政策导向、理论自觉与实践诉求构成了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驱动逻辑。

（一）政策驱动：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更是社会各领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① 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其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求日益强烈，这意味着基础教育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满足基本教育需求转向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基础教育最紧迫、最核心的任务。

围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3 年教育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致力于深化基础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基础教育育人水平；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强调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国家层面的这些重大战略布局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折射出国家战略的新需求和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变化，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学学科适逢其时。

学科是知识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进步和认知更新不断演进，以更好地满足时代需求。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上述教育发展态势与时代要求，2024 年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新增基础教育学为教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未来有必要加强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助力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二）理论驱动：构建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学的内在要求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方向。作为新兴的二级学科，基础教育学应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根本路径，增强学科的独立性与成熟度。

一方面，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助于彰显基础教育学学科的“中国特色”。从学科发展的渊源来看，中国教育学的根基并非完全源自中国文化的内生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引入的“舶来品”。如果从 1901 年王国维翻译引进教育学算起，中国教育学已经历了 120 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教育学在中国”的翻译引进阶段，教育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国外理论改造阶段，到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阶段。^② 在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已经成为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这也为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基础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重要分支，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既要体现基础教育的普遍规律，又要彰显中国特色的教育智慧，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学。

另一方面，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助于彰显基础教育学学科的“基础教育特色”。

^① 柳海民，侯怀银，余文森，等. 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笔谈）[J]. 教育科学，2024（5）：1.

^② 冯建军. 当代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新进展：2010—2020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23.

在基础教育学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前,我国学界已经对基础教育开展了大量研究,比如,徐虹和傅金兰主编的《基础教育学》、汪潮主编的《基础教育学》等。此外,基础教育领域分学段分学科的著作也有所积累,比如,童顺平主编的《小学教育学》、班华主编的《中学教育学》、梁镜清主编的《小学数学教育学》等。这些研究都为后续基础教育学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突破。譬如,有学者认为,应该突破“基础+教育学”的简单叠加,形成“基础教育+学”的有机知识体系,加强基础教育学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①;此外,也需要突破“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的简单叠加,遵循一体化贯通式的构建思路,形成对基础教育的整体认识。

(三) 实践驱动:应对基础教育发展挑战的现实诉求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显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多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验中表现抢眼,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反映出的阅读、数学等学科合格率与PISA测验反映出的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达标率基本相当,整体达到排名前15位国家水平;同时,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中有升,2023年达到91.8%。^②在质量提升方面,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义务教育质量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上海数学教学模式”等成功经验在多个国家得到推广应用。此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持续深化,2022年颁布实施的新版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全面推进育人方式变革,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专业能力实现整体跃升,为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教育实践探索和发展经验为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基础教育也面临着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的挑战。首先,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城乡间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突出,学校硬件设施差距大、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亟待解决。^③其次,素质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亟待深化推进,现行评价方式与创新人才培养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最后,新技术赋能教育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仍要进一步探索。面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践为导向,紧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实现基础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基础教育实践的协同发展。

二、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遵循

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培根铸魂与推陈出新的辩证统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自主与开放相统一。

(一) 守正创新:坚持培根铸魂与推陈出新的辩证统一

基础教育学作为新兴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深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沃土。正如幼苗需要深扎根系方能枝繁叶茂,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明根脉”,在守正创新中促进理论体系的蓬勃发展。

^① 时益之,侯怀银.基础教育学学科建设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23(7):66.

^② 丁雅诵.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发布[N].人民日报,2024-06-11(7).

^③ 李涛,黄嘉欣,王娜,等.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均衡发展水平测量:基于全国东中西部五省份的实证调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①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更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学科的理论底色。自学科发轫之初，中国教育学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探索历程。^② 从1929年杨贤江《教育史ABC》的问世，到《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出版，这一发展脉络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教育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行动纲领。^③ 具体到基础教育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提供了核心指引，推动着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基础教育改革。近年来，基础教育中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探索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重要教育思想的直接践行和时代诠释。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华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智慧，“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因材施教”的个性化育人理念、“教学相长”的师生互动原则等传统智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因此，在新时代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及创造性转化，如传统教育中的“君子不器”思想可以转化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知行合一”理念可以发展为学科实践、综合实践活动的创新模式。“循序渐进”教学原则可以指导课程体系的科学设计，建构起符合认知规律的知识体系等。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对传统教育精髓的时代重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育人需求的有机融合。

（二）知行合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理论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平衡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更削弱了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双向断裂现象。一方面，一线教师难以超越对教育经验的描述性和碎片化总结，无法将丰富的实践智慧升华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在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时面临转化困境。以近年来涌现的深度学习和项目化学习等理论成果为例，虽然这些研究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一线教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惑，最终导致理论悬浮于实践之上，无法真正落地生根，教育理论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解释说明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对教育理论进行实践化改造^④、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建立范式转化或中介^⑤、协调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主体关系^⑥等，这些研究为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从本质属性来看，基础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基础教育学必然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将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教育实践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

①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5 (2).

② 冯建军.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其自觉建构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3 (6): 5.

③ 冯建军.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 [J]. 中国教育科学, 2024 (3): 27.

④ 余清臣. 论教育理论的实践化改造 [J]. 教育研究, 2016 (4): 25.

⑤ 李有发, 严万跃. 范式的转化研究：教育理论实践化的桥梁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3 (4): 35.

⑥ 吴洁. 试论教育理论成果转化中的主体性问题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9): 13.

系的不竭源泉。“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征行”，归根结底需要紧密根植于中国基础教育创造性实践的“征行”。只有真正实现理论研究“向下扎根”与实践创新“向上生长”的辩证统一，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进而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两个维度展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交流互鉴：坚持自主与多元开放相统一

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确立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从根本上破除长期以来对西方教育理论的依附思维，彻底摆脱亦步亦趋的“学徒状态”。中国教育学历长期处于西方教育理论的遮蔽之下，呈现出以西方理论体系为主导的情况，在很长时间内都扮演着“创新接受者”的角色。^①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恰恰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突破口。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好的，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要坚定文化自信，把自己好的东西坚持好，把国外好的东西借鉴好。^②基础教育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发展最迅速、改革成效最显著的教育领域，自2011年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至2022年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这一跨越式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教育学从“创新接受者”转向“创新生产者”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自主性原则，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发展模式的道路自信，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坚持自主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也不意味着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多元开放的格局中推动理论创新。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宽广的视角、开放的胸襟、坦诚的对话、平等的互鉴^③，广泛汲取世界教育文明的优秀成果，使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华转化为滋养中国基础教育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此外，构建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具备世界情怀。基础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奠基工程，其重要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20世纪末以来，各国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例如，经合组织对“核心素养”的探讨、美国对“21世纪技能”的探讨、我国对“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探讨等，无不折射出当今时代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因此，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从特殊性中提炼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认知，将中国教育实践的特殊经验升华为符合人类文明规律的普遍原理，最终形成既能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能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基础教育大国向基础教育强国的理论跃升。

三、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实际上是把“三大体系”建设作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行动指南。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协同推进为根本路径，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辐射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推进学科体系建设，筑牢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根基

目前基础教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明确其学科内涵、学科定位与学科建制对于学科发展意义重

^① 冯建军，温晓情.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现实困境、必然要求与必要转向 [J]. 社会科学战线，2024（7）：239.

^② 王嘉毅. 坚定教育自信 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基础教育 [N]. 学习时报，2024-01-03（1）.

^③ 张东刚.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J]. 中国社会科学，2024（5）：99.

大。此外,依照传统学科标准,一门学科的独立要以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为前提,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要素进行系统性探讨。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学科的细化和综合化,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的交叉已成为普遍现象,基础教育学学科独特性更多体现为相对差异而非绝对排他。

学科内涵的清晰界定是基础教育学创生发展的逻辑起点。《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将基础教育学界定为“一门研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规律,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应用性学科”,这一表述阐明了学科的内涵。从学段划分来看,基础教育学聚焦于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涵盖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与普通高中教育两大范畴。从教育属性来看,基础教育学归属于普通教育体系,致力于培养中小學生普遍的科学文化素养,是国民教育中奠定基础的部分。为实现学科价值,基础教育学必须以实践性和应用性作为研究的基本取向,这要求研究者在理论建构的同时,注重研究成果向教育实践的转化应用,使学科发展既能回应基础教育现实需求,又能为教育决策提供学理支撑。

基础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定位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基础教育学是教育学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延伸,需要遵循教育学的普遍原理与规律性认知,确保研究结论与教育学基本原理相契合;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学又具有学科独立性。它并非教育学的简单映射或局部缩影,不是教育学的翻版^①;而是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学科体系,通过对普通中小学教育这一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建构具有独立价值的知识生产体系。这种学科定位要求基础教育学既要依托教育学母体的理论滋养,又要立足基础教育场域的特殊性,为破解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提供独特的学术智慧。

基础教育学要获得更大的学科发展,必须通过体系化、组织化的学科建制确立其合法地位。学科建制包括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两个维度。在内在建制层面,基础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学前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等处于同一层次,均属于二级学科,因此可以遵循这些相对成熟学科的发展路径,细化基础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在外在建制层面,则要突破学术管理体制的制约,通过实体性院系组织汇聚研究力量。学科建设必须以实体院系为依托,缺乏稳定的组织机构便难以凝聚人才开展系统研究,只有通过整合研究资源与搭建学术平台才能解决学科建制问题。

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其存在的根本前提,子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要遵循母学科的内在逻辑。基础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要置于教育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界定。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主要有教育事实说、教育现象说和教育问题说等代表性观点。鉴于基础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特定阶段和具体领域,基础教育学研究对象则是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化,涵盖了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现象及教育问题。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可以清晰地认识基础教育的基本要素与本质,揭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基础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具有广泛性与复杂性,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基础教育的一般理论研究、基础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研究、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三大领域。基础教育的一般理论研究着重厘清学科内涵与基本属性,系统建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及方法论等学理根基,并深入揭示基础教育办学规律,涵盖了基础教育的学制演变、不同国家基础教育比较等核心命题。基础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研究聚焦教育活动要素,围绕课程开发、教学模式创新、管理效能提升、评价制度改革及师生发展机制等命题展开系统探究。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则直面基础教育变革的前沿

^① 蔡勇强,黄清,李建辉,等.基础教育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22.

议题,主要包括基础教育的政策、不同学段的衔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基础教育管理与评价改革、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等现实课题,同时回应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育人方式数字化转型等前沿趋势。

研究方法可以为基础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工具支撑。基础教育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发展性,要根据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变化与要求进行动态调整,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学在继承观察法、文献法和调查法等经典方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方法创新。例如,促进区域教育均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始于江浙地区的探索,并逐渐上升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经验,彰显了基础教育研究以实践问题为导向,通过行动研究反哺政策创新的方法论特质和实践改造精神。^①此外,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加速,基础教育学研究要进一步引入数字技术手段,如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通过云计算平台评估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效能等。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基础教育中的复杂问题。

(二) 深化学术体系创新,激发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生动力

基础教育学学术研究中新思想的提出、新理念的建构、新规律的发现、新学说的创立以及新理论的阐释,都能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注入不竭动力。这要求我们系统推进基础教育学学术理论体系、学术组织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构建持续创新的学术生态系统。

基于前述对基础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其学术理论体系可凝练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理论模块,分别是基础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实践论、基础教育主体论和基础教育治理论。其中,基础教育基本理论聚焦一般理论问题,通过探究基础教育的本质属性与运行规律,构建具有统摄性的理论框架,为学科提供专业知识的“基点”。基础教育实践论立足中小学教育场域,着力解决学科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等问题,凸显实践导向的行动逻辑。基础教育主体论以师生发展研究内核,通过剖析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素养培育机制,彰显教育领域的人文关怀。基础教育治理论则围绕中小学校的治理与评价等问题展开研究,体现对教育治理效能的系统性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理论体系是基于现有研究领域的有限归纳,并不能涵盖所有细节或潜在的知识要素。随着基础教育改革深化与学科演进发展,基础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扩展完善,以适应新的需求与挑战。

学术组织机构作为学术探索的桥梁和纽带,在学术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级研究机构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侧重基础教育的政策性和战略性研究^②,为学术体系发展提供方向指引。高校附属研究机构依托学术资源优势强化理论创新,以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为例,其秉持把握社会转型特征,深入研究基础教育当代问题,扎根中国教育实际等宗旨,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互动共生的研究特色。在省级层面,如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河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中心等科研机构着力破解区域教育发展难题,为地方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学相关学术组织机构的协同创新,通过整合多层级研究力量为学科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基础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核心在于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并强化学科归属感。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为学术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南大学等高校已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基础教育学硕士、博士招生点。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则是依

^① 钟秉林,袁振国,孙杰远,等.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未来教育与基础教育学建设(下)[J].基础教育,2022(4):43.

^② 赵鑫,谢小蓉.我国基础教育学学科演进、本质内核与发展趋向[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2(3):4.

托学科教学和小学教育专业，源源不断地为基础教育领域输送专业人才。^①学术刊物为学术共同体的知识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载体，《基础教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基础教育课程》等专业期刊的蓬勃发展^②，既拓展了学术交流空间，也增强了学科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基础教育学要进一步推进学术学会、期刊集群及国际会议制度建设，通过规范化的学术活动凝聚学术研究力量。

（三）构建话语体系矩阵，实现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表达

话语体系作为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言语表达系统，应遵循凝练、转换与传播三位一体的建构逻辑。中国基础教育学话语体系具有承载中国基础教育学知识内容和塑造中国基础教育学知识形式的功能，既承载了中国基础教育事理和教育学理，又塑造了中国基础教育学知识的外形、体系和风格。^③向世界传递中国基础教育之声，促进基础教育经验在国际范围的深度传播，是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

首先，话语的凝练要紧扣前沿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并以此为抓手推动话语体系建构。毋庸置疑，标识性概念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涌现出“立德树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跨学科主题学习”“教育家精神”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基础教育学话语创新取得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基础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还要进一步突破碎片化困境，通过系统整合推动概念从零散走向体系化，实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逻辑联结与理论跃升，最终形成体系化、学理化的基础教育学话语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将“教育是什么、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谁来培养人”这五个根本问题作为逻辑主线^④，对中国基础教育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化提炼，最终构建起逻辑严密、科学系统的话语体系。

其次，要关注多元文化和教育差异背景下不同国家教育话语之间的转换与相互理解。中国基础教育学话语体系不能自说自话，而应该以话语转换为桥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互鉴与实践对话，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平等交流。在符号层面，要将“教育家精神”“立德树人”等标识性话语置于全球教育治理框架中，既保留其文化基因，又重构为可理解的学术符号。在价值层面，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等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现代化与国家发展”的学理命题，揭示中国教育支撑民族复兴的内在逻辑。在实践层面，要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经验升华为教育公平等普适性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教育难题提供参考。此外，话语转换还要遵循国际学术规范，保持概念界定的严谨性和逻辑推演的完整性。由此实现从特色表达到共识建构的转换，形成在中国经验中凝练普遍规律，以普遍话语传递中国智慧的双向转化机制。

最后，在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格局中要强化国际语境下中国教育话语的对外传播。中国基础教育学话语的国际传播要系统性构建传播矩阵，通过多维度协同路径推动本土话语“走出去”。在理论对话层面，应借助国际学术交流、学术期刊、学术平台等途径，与西方学者展开深度对话，破除认知隔阂并提炼共识性理论命题。在技术赋能层面，要依托数字化技术革新传播范式，将文字主导的传统叙事转化为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的立体化叙事，使中国基础教育实践成果可视化、可感知。我国在教育扶贫、课程改革和教研制度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应当通过有效的国际传

①③ 柳海民，侯怀银，余文森，等. 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笔谈）[J]. 教育科学，2024（5）：11，5.

② 钟秉林，袁振国，孙杰远，等.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未来教育与基础教育学建设（下）[J]. 基础教育，2022（4）：44.

④ 温晓情，冯建军. 中国特色教育学标识性概念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16.

播机制,在世界教育学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世界教育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①,增强基础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四、建构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展望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基础教育学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当今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崛起既是推动世界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界定这一变局的关键要素。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传承教育传统、发展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逐步探索出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样态,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这表明,基础教育学这一新兴学科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借助国家发展这一“大势”,基础教育学的发展未来可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三大体系”为指引,加强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在这“三大体系”的指引下不断推进。因此,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基础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内涵、学科定位与学科建制,从学理上深入探讨和厘清基础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是强化实践经验研究,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秀经验进行提炼并上升为理论、观点和主张。毋庸置疑,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为基础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土壤。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基础教育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以新的理念引领课程与教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逐步培育起新型教育生态。例如,2022年教育部印发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并于2023年组织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持续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深化改革,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遴选一批国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实验校,实施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计划,评审和推广中小学教育教学成果,形成一批教学方式改革的典型方案和教学案例。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基础教育学学科发展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更为中国特色基础教育相关理论的创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是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既“引进来”,又“走出去”,加强我国基础教育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交流。在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潮流下,任何国家的教育发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化的影响。一方面,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开启了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以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明确了国际化发展的方向;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了推进国际化的意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借助PISA测试等国际性的教育评估项目,我国学生的表现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系统总结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成就,对中国教育的当代价值进行论证,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教育话语的力量,建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总之,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新时代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实践进入新阶段后,对中小学校丰富而又鲜活的实践经验进行凝练总结的必然要求。

^① 王坤庆,胡春光.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方法论基础[J].中国教育科学,2024(5):45.

当前，与科技、经济领域的自主发展相呼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自主意识也日益增强并积极付诸实践，学界已就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达成广泛共识。在教育科学领域，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围绕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乏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和教育流派，学术传承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文化根脉是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强大动力。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加持下，中国基础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备充足的信心与底气。展望未来，随着基础教育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和学科理论知识的谱系化，基础教育学专业知识体系必将充分彰显中国特色。这不仅有助于阐释中国的教育实践与经验，进一步揭示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发展规律，还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跃升提供助力。

（责任编辑 曹周天）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Basic Pedagogy

Yang Mingquan, Zhao Yao

Abstract: The designation of basic pedagogy as secondary discipline within pedagogy has provided a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Driven by the triple logic of policy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demand, constructing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basic pedagogy has become a crucial undertaking.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reserving integrity while innovating,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mutual learning through exchanges. It requires achiev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urturing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nation and theoretical renewal,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balancing autonomy and openness i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Guid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ajor systems”, advancement of the system necessitates consolidating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innovating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matrix.

Key words: basic pedagog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ree major systems”